

第一篇

第一章 政变与刺绣

2010年9月初，我与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商讨本书的写作。那是在她玫瑰宫的办公室里，我永远忘不了将我引领到她跟前的那永无休止的几步路。她在书桌另一端等着我，站立着，身穿一件带翻领的主教红色的外套。片刻之前，在总统府前厅，当一位女副官和一个警卫员说话时，我问自己，那些种在巨大花盆内的棕榈树被人修剪了枝丫，这到底是女总统下的命令，还是历来如此：枝条都整饬有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站在总统府的前厅，当时十分紧张。我觉得这是个有性别歧视色彩的问题，怎么能问一位女总统：“是您亲自负责总统府的植被吗？”

对我而言，这不是一场气氛轻松的采访。我必须克服她的外在形象来书写她本人，同时还必须对她讲述我头脑中对她的看法。这本书本应该成为另外的模样，是我们曾经谈论过的那个模样，但是现在不能那样写了，主要是因为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忽然去世了。

我希望围绕着克里斯蒂娜20岁那年的一帧照片讲一讲。那帧照片拍摄于拉普拉塔动物园的铁栅栏前。现在在博客上常被转发。照片上，她目光低垂，头发很长，额前的头发被发卡束好，露出宽洁的额头。她抽着烟，身材纤细，身着紧身裤，上身穿着修身的小衬衫。

那天晚上，我跟她讲述的总体想法都是围绕这幅照片展开的。我打算问她，照片上的那个小姑娘，一名1973年的大学生，当时“过着怎样的生活”。那时，她是站在成百上千个庇隆主义党员中的一名。这小姑娘

娘对众人而言，在当时还是个谜。这个想法又总与另一个念头相关：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和内斯托尔·基什内尔穷其一生坚守着他们那个时代，而他们领导的政府也响应着那个时代的号召。当内斯托尔从总统府的墙上取下魏地拉、比尼奥内以及本迪尼的肖像时；当内斯托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宣称他是五月广场上的那些母亲与祖母们的儿子时；当他说到“失踪人士”时，称他们为“我的同志们”的时候，我即刻领悟到这一点。

虽然我把票投给了内斯托尔，但那时对他并没有多少信心。经验告诉我，不应该轻信，而应该审慎，因为权力会腐蚀所有人。正如在阿根廷，我总会看到权力败坏人的思想。然而，等到内斯托尔的执政风格呈现出某些粗线条的轮廓之后，我有着特别强烈的感受：我们所面对的和以往所经历的完全不同，虽然还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因为从来没有一位阿根廷的民选总统把肮脏战争中^❶的失踪者称为“我的同志们”。

细致了解了他们两人的青春岁月之后，我知道“我的同志们”这一称呼并非隐喻，也非委婉的说法。他们两人都来自革命热情高涨的1973年的拉普拉塔。他们在青年时代就加入了党派组织，虽然反对武装斗争，但他们同很多人一起梦想着拥有真正的祖国，摆脱殖民地的阴影。

“我的同志们”这一称呼包含着特殊的理念和对逝者的承诺，也令我感受到为逝者争取正义的尊严。我第一次听到了一代人的呼唤，邀请人们去引发超越个人命运而置身于集体的思考。每当我们讲到“集体”，不应该只想到当下时刻。“集体”一词和“我们”的含义包括许多代人。

正因为如此，当我第一次考虑到本书的创作时，我想应当围绕克里斯蒂娜的这张照片展开。我想要重现这个年轻姑娘梦想中的乌托邦，在这样的背景下讲述她的生命历程：我要知道那个姑娘曾经具有的何种精神，仍旧跳动在女总统的胸膛；哪些观念仍旧初衷未改，而哪些观念随着岁月已变迁。

^❶ 此指1976~1983年阿根廷军政府以暴力抵制不同政见人民的行动。——译者注

然而，2010年10月27日，内斯托尔去世了。这本书的构思需要全盘更改，这不算什么。与逝者相比，无足轻重。我曾想过放弃本书的写或者先搁置一旁，因为我觉得克里斯蒂娜失去伴侣之后，我不能再接近她。他们告诉我先等一等，一边继续工作一边等待，她正面对丧夫之痛。他们还告诉我，虽然我几乎天天看见她在仪式上讲话，身着黑衣，从她丈夫去世的次日就开始毫不停歇地工作，然而许多次，每当痛苦来袭，她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或者其他能够藏身的临时处所中，独自啜泣。

或许我可以说，现在的我也体会到了孀居生活，了解到她所背负的东西会带来巨大压力。出于同情和理解，我又再次提议，是否可以放弃本书的写作计划。这本书的负责人总会给我相同的答复。这个人就是总统的秘书长奥斯卡·帕里义，他对我说：“她能行的，但她需要时间，等她准备好了会通知你的。”

虽然他的话我没有全信，但我还是跟记者维纳·佩尔托特疯狂工作了几个月。通过对不同见证者的采访，我重建了他们的生命历程和党员生涯。1974年之前，只需要谈谈克里斯蒂娜。但在那一年之后，她的生活就复杂起来。内斯托尔和克里斯蒂娜之间有一种其他夫妻之间少有的密切联系。既然得知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如此交织重叠，也就很难仅仅关注两人当中的某一个了。

最后，当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的时候，又到期限了，我再次提出，既然时间紧迫，不如把出书计划继续推迟。就在此时，帕里义打电话告诉我：“总统说，这个周六你们可以在埃尔卡拉法特见面交谈。”三天之后，我见到了她。

在我们的第一次会谈中，她就曾经告诉过我，假如要写她的生活，我们就应该约在埃尔卡拉法特，看过绿色与白色的埃尔卡拉法特之后，就能更好地理解她本人，更好地理解她在那里的感受。她还对我说，应

该去看看她的玫瑰花，她会带着园丁手套亲自照料它们。因此，我们最好在卡拉法特见面，而不是奥利沃斯宫，因为她在自己家里更放松，而她的家在南方。

在第一次会谈中，我还保留了一段个人回忆。我们在她的办公室谈到很晚，这时秘书给她递过手机来。电话另一端是内斯托尔。于是我听到了他们夫妻之间如何对话，也见证了这对夫妻间频繁互相致电中的一通电话。后来在我们谈话中为数不多的忧伤时刻里，她告诉我，他们两人都把对方当做必不可少的倾诉者。我不知道那晚他们到底聊了些什么，但我还记得她说话时的腔调。有一点讥刺、彼此信任而言谈随意、零星穿插一些粗话。其中一个时刻，克里斯蒂娜对她丈夫说：“我正在跟一位你会喜欢的女记者聊天呢。”出现了一段停顿，而后她笑着反驳说：“得了吧，亲爱的，你不那么喜欢女记者。”挂上电话之后，她告诉我：“内斯托尔要献给你一个吻。”

我曾经三次见到内斯托尔本人，却无缘私下会谈，但在这里，我还想追忆一下，他给我打过的唯一一通电话。那是2004年5月。我当时在《第十二版》日报编辑部工作，是文化演出版的编辑，但时不时也写写政治专栏。那一天，我刚刚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谈论5月25日^①数以百计的出租车带着小小的阿根廷国旗出现在街头巷尾，这是第十频道的广播鼓动的。前一天，内斯托尔当选总统后接受的最初几个访谈中的一个就是与这家广播电台的。我在专栏中写道，基什内尔“已经给右派赠送了一块小糖果，可以预见，右派会继续把这块糖果含在嘴里的”。这两行文字插在一段不太显眼的新闻中间。当天下午，日报给我转过来一通电话。他们告诉我：“主席^②先生要跟你讲话。”我想可能是某个组织的主席，但怎么也没想到会是国家总统。内斯托尔的声音出现了，他对我说：“是桑德拉吗？”我下意识地回答道：“是内斯托尔吗？”我心里暗

① 5月25日是阿根廷国庆日。——译者注

② 西班牙语的“主席”和“总统”是同一个词。——译者注

骂自己怎么这样失礼。但他只是笑了笑，原谅了我的错误。我不记得完整的句子了，但我还记得谈话的最后部分：“我早就习惯跟睿智的女性打交道了。你想象一下，每天都有克里斯蒂娜在旁边……”而后，他又告诉我：“我打电话是想告诉你，我读了那条新闻，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错了。”听了这话，我完全手足无措了。

那天早晨我来到埃尔卡拉法特。有人来找我，并把我安排在一家酒店里。一小时之后，克里斯蒂娜的私人秘书之一、埃尔卡拉法特人巴勃罗·巴雷罗给我打来电话，确认说将中午过来找我，然后陪我去女总统的家中。余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坐在酒店的长廊，看着地平线上白雪覆盖的山峰和万丈阳光下从冰雪间蒸腾而出的薄雾。这时，绿色的埃尔卡拉法特跃入眼帘。

此时已然是中午了，在巴勃罗的陪伴下，我们走过一片巨大的花园。花园里，沿着棕色围栏的周边，可以看到生长得浓密而健康的玫瑰花丛。我深吸了一口巴塔哥尼亚的空气，许多被我采访过的“企鹅”^❶都曾谈论过清冽、强劲和有质感的巴塔哥尼亚空气。

基什内尔家的公寓很大，遵照着南方人所谓的“历史性”建筑风格。屋上盖着金属的黑瓦，四壁是砖石墙面，窗台上摆着花。我们走到房前，上了一段台阶，房门是敞开的。克里斯蒂娜穿着家居服迎接我：黑裤子，黑毛衣，净面素颜。

我们目之所及的大格局里，一片空间连着另一片，许多角落里都放着松软的座椅。所有陈设都让人觉得舒服。除了房子的视野，绝无奢侈之物。从房子可以望见环形海滩和雪峰。室内一切都堪称完美，布置得也恰到好处。四下一片静寂。

我们来到紧挨着厨房的起居室，我猜想那是她最常去的地方。她走在前面，指给我一个单人沙发，我便坐了下来。她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

❶ 在阿根廷，内斯托尔及其拥护者被称做“企鹅”。——译者注

来，两张沙发之间隔着一张深色木制边桌，我将三个录音器一一摆在桌上，一个数码录音笔和两个卡带录音机。“需要这么多？”她问我。我回答说，在等待采访的几个月中，我有两三次梦见录音笔失灵而从梦中惊醒。我俩都笑了。在采访中间，她也很懂得利用录音笔的便利，因为当卡带停转，我需要翻面或换磁带的时候，她就会说：“数码录音笔还在走，对吧？”而后便没有停歇，继续讲述。

我请求她从最初的记忆讲起。别人曾写过，并且大家都知道克里斯蒂娜的父亲是反庇隆主义者，她的母亲却属于庇隆主义者。我还知道她跟妹妹席塞乐关系很亲密，因为在第一次访谈中，她就曾对我说：“我要说……你知道吗？”仿佛她对自己说出的话感到惊讶似的，“我妹妹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在她讲述的不同故事中，经常出现这些话：“你知道吗”“你看”“我以前从没想到”“你看，我怎么会这么想或那么想”。我甚至想，她此刻讲述的许多事情，或许此前从未全部讲过；这些故事沿着一条指引的线索发展，而实际上，她生命中的不同时刻第一次被这样地整合到一起。

关于她在托洛萨和拉普拉塔度过的童年和青少年，我原来不甚了解。我注意到，几乎我阅读到的所有材料，都介绍说克里斯蒂娜童年生活在一个核心家庭里，即父母双亲加两个女儿的小家庭。但事实从来不是这样，这个家庭比较庞大，外祖父和一位姨妈跟这家人住在一起，他们两人对费尔南德斯家的两个姑娘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实际上，我请求她从头讲起，从她最早的记忆讲起。于是，她的思绪就飘向了遥远的记忆。我们之间隔着那三支录音笔、盛着浓缩泡沫咖啡的白瓷杯和一盘让我很难移开视线的巧克力糖。那些巧克力色泽鲜亮、形态各异、夹心也不尽相同。在盘子四角上放着的巧克力是树叶状的。不过，我一块儿也没吃。

1955 年

这是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记忆中最初的几幅画面之一。这幅画

面既是家庭的，又是政治的。她刚刚两岁半，最初都是无声的画面，随着时间的流逝，才会加入语言。她的母亲和姨妈这两位女性悉心照看着她。此时，她们在租住的第四大街和第三十二大街交汇处的家门口，显得心烦意乱。母亲奥菲莉亚·威尔姆和姨妈诺艾米·威尔姆望着有轨电车进站的方向，每天外祖父就是从那里下车，再走回家里的。外祖父当时在里奥圣地亚哥的海关工作。

年幼的克里斯蒂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一天其实是发生政变的日子，这一年是1955年。母亲奥菲莉亚和姨妈诺艾米无法平静下来。她们两个时不时地将她抱起来，而后又放下；往前走几步，又后退几步。两个女人一直说着外祖父。

“爸爸来了吗？”

“爸爸没事儿吧？”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那个人不是爸爸吗？”

她们都望着有轨电车站的方向，那也是里奥圣地亚哥的方向。在风景深处，可以看见发红的天空中矗立着几个巨大的柱子和YPF石油公司的油罐，旁边就是海关。卡洛斯·威尔姆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辈子都是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民保守党党员，其实他很多年前就已经是一名庇隆主义者了。在推翻庇隆的那天，海军上将罗哈斯威胁要轰炸里奥圣地亚哥的蒸馏厂。威胁演变成真实的轰炸事件，这起轰炸事件就发生在轰炸五月广场之后，它造成了庇隆无法还击的局面。

“这幅画面没有配上语句，但后来我自己把语言复原上了。”克里斯蒂娜说道。奇怪的是，她讲到幼年时的自己，声音和平时演讲时的沙哑声音不同，“妈妈和诺艾米姨妈在门口抽泣，她们搓着手，望着街角。我的外公被囚禁了两天。我们几个人住在一起。我很敬爱我的姨妈和外公，我的庇隆主义思想就是从那里继承来的。正是他，我的外公，让我成为一名庇隆主义者。”

外祖父卡洛斯·威尔姆是一名保守主义者，激进主义者集会的时候，他曾经带着两名男子给激进分子的汽车轮胎放气。当克里斯蒂娜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外祖父曾经带她去海关。克里斯蒂娜一直记得通往海关的路。他们乘坐有轨电车，坐到拉普拉塔站，从那再搭乘火车。说到这里，克里斯蒂娜停住了，因为当她开始讲述的时候，头脑中就浮现那一时代的另一幅画面。她想起了火车站旁边的里塞奥海军学校的士官生，他们全都穿着白色制服，披着黑色斗篷。

她说，外公带她去上班，对她而言就像过节一样。外祖父的办公室，木地板洁净发亮。许多年之后，她发现了外祖父的入党证书。证书的封皮是深棕色的，上面有庇隆和艾薇塔的画像。当她跟我讲述这些经历时，她第一次插入了自己的政治理解，在随后的关于童年讲述中，她又如这次一般，多次插入政治理解。她告诉我，想要了解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就必须了解人民保守党，索拉诺·利马就属于这个政党。初期庇隆主义从人民保守主义的党组织中汲取了不少养分。她说，这个政党不像北方省份的保守主义政党那样，后者是代表寡头阶级的政党。

“我外公受过穷，年轻时又在肉品加工厂工作过，他怎么会保守呢？等庇隆上台，开始搞节日奖金和带薪假期，你想想看吧。这个时期，我外公为副省长米克斯工作。我妈妈还记得，外公曾经带着她去副省长的办公室，米克斯问他：‘黑伙计，你怎么有这么漂亮的一个丫头？’因为我外公皮肤黝黑，而我妈妈皮肤白极了，跟我外婆一样。我外婆是个西班牙美人，眼睛是紫色的。那次拜访当中，他们还给我妈妈带上了红色的贝雷帽。而外公那时候还向激进分子开过枪，你看那时候就是革命者了。”说到这里，克里斯蒂娜笑了。

当时人民保守主义思想号召兴建一个基础设施良好、道路交通完备的阿根廷，并强调国家的参与，但却认为阶级关系已经固化，没有变化的可能。等到底隆上台，很多人立即拥护他，正是因为庇隆提出了阶级的可变性并且为工人阶级打开了新视野。很快，克里斯蒂娜的政治表达

再次和个人情感回忆掺杂在一起。

“然而，1955 年的政变一发生，这一切就结束了。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被迫搬家了。” 克里斯蒂娜说。

1955 年政变之后，很多庇隆主义的法律都被废止，其中包括房屋租赁法。上面提到的第四大街和第三十二大街交汇处的房子是租来的。那是第一场骚动，也是第一场社会地震：忽然间数以千计的房屋租赁合同都失效了，因为房东希望把房子出租给出价更高的人。从那时起，克里斯蒂娜一家人就以另一种方式生活了。至少对于克里斯蒂娜是如此，当时她还是个小女孩。人民的生活开始变得更加艰辛，社会更加动荡。

负责照顾她的大人们都在为流离失所而操心，心思都花在如何再租一栋房子上，由于无房居住，一家人只能带着家具找住处。由于庇隆及其追随者被放逐海外，国内缺乏自由，即便如此，后来的阿根廷将是另外一番景象，情况会更为恶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家人买下了一块地，然后在上面盖了自家的房子。虽然庇隆主义的社会福利法案已经垮台，但人们还能找到工作，因此当时的贫困率还比较低。克里斯蒂娜一家的房子建在拉普拉塔市第七大街和第八大街之间的碧斯 522 号大街上。时至今日，克里斯蒂娜的母亲仍然住在那里。虽然当时庇隆主义已经被禁止，但外祖父还是把克里斯蒂娜抱上膝头，并不是给她读故事书，而是把《我生命的理由》（*La Razón de mi Vida*）展示给她看。这个小姑娘还不认识字，但专注地盯着艾薇塔的外套和服饰。

服饰还将在她的童年生活中占据独特的一章。虽然她没有在衣服的问题上花费很多唇舌，但也透露出在这个国家，当时的工人阶级也能买到绸缎、天鹅绒和薄纱。服饰、洋娃娃和书籍，是克里斯蒂娜童年生活的主要支柱。

“妈妈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她想让我和妹妹席塞乐拥有她当年没能得到的东西。她自己的童年应该是更加艰苦的，肯定没有这么多洋娃娃。所以她给我买一切东西。别兰赫莉洋娃娃、比维亚娜洋娃娃，

还有许多最漂亮的洋娃娃。我那时还拥有一整套的过家家玩具，包括一个小梳妆台、一张小床、一个小厨房和一组小衣柜。妈妈甚至把我也打扮成生日蛋糕上的糕点娃娃的模样。衣服都是她给我做的……多么不可思议，你看这些衣服，我小时候就穿了。我现在还记得有一件黑色百褶裙，非常漂亮，裙摆很大，原本是我妈妈的。我穿上这条裙子，假装是她。好多年以后，我遇到了一条一样的百褶裙，是巧克力色的，立刻就把它买了下来。我现在还会穿它，我对它情有独钟。等下次我穿这条裙子的时候，告诉你，让你看看。我还记着当时的一些服装，都是妈妈精工细作的。有一件带刺绣的裙子，是她为了庆祝我的生日缝制的。那条裙子配了一条珊瑚红色的丝绒腰带。真是美极了。我记得还有一条裙子是天蓝色的纱裙，也有褶儿，后背上还缀着玻璃扣，领口是婴儿式圆领。这条裙子上也有一条腰带，用的是更亮一些的布料，颜色也比天蓝色更深一些。是不是因为这个，我才那么喜欢束带和腰带呢？是不是因为这些衣服都是妈妈做的？能回忆起这些事情是多么出人意料啊。我的姨妈诺艾米得了癌症，年纪轻轻就去世了，不过我还记得小时候我看她化妆，我很喜欢看。妈妈和姨妈经常打扮自己，但姨妈才是那个会给自己化妆的人。妈妈不经常化妆。姨妈对手提包实在是着迷……你看，手提包啊！她很冶艳，非常冶艳。我还记得她那双手，永远完美的指甲，永远修剪得特别漂亮的红指甲。伴随我成长的两个女人，都非常女性化，不会放弃她们的女性身份。正好相反：她们会不断强化自己的女性魅力。我还记得另一套衣服，那件蓝色套装的布料真是不可思议……妈妈是从哪儿找来这些布料的呢？在拉普拉塔，曾有一家布料店，叫做‘两个表兄弟’，这家店很出名，因为里面出售别处没有的面料。对我们来说，那可是一件重要的出游安排、一项重要活动：跟妈妈逛‘两个表兄弟’面料店。”

费尔南德斯一家一直和外祖父卡洛斯和姨妈诺艾米住在一起，外祖

父鳏居多年，而姨妈那时候是单身。姨妈的生日是2月18日，她为此跟姐姐奥菲莉亚陷入了长久的斗争，因为她想让大家把克里斯蒂娜的生日也登记成2月18日，这样就可以一起过生日了，尽管克里斯蒂娜的生日比她晚一天，是2月19日。“女儿是19号生的，你怎么能叫我登记成18号呢？”克里斯蒂娜回忆说，她听妈妈这样喊道。姐妹俩为这件事争执了很久。她们虽然经常吵架，但其实相处得很好。妈妈、姨妈和外祖父都会给她们买书。那时候，书籍是挨家挨户上门推销的。百科全书、多卷本的字典、全套选集、艺术史、百事通类书籍、辅导书。可他们几个人一本也不读，书全是给克里斯蒂娜和席塞乐购置的。这些书不仅激发了她们战胜自我的意志，也是未来事业对她们发出的邀请。克里斯蒂娜开始阅读所有来到她家里的书籍。所有书籍，甚至包括字典。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书籍对她而言，是一种庇护、一种消遣、一次停歇、一段时间的隔离独处，也是新的观点和思考的源泉。

克里斯蒂娜说，她妈妈不读书，其中一条原因是每天都要工作。那时候，妈妈在税务局总办公室上班，有一段时间还是负责人。但是除此之外，等克里斯蒂娜记事了，她还担任税收及不动产雇员协会（AERI）的秘书长。她是个“非常特别”的工会会员，克里斯蒂娜说的时候语调上扬，有着重强调的意味。她母亲在工会工作的二十年间，从未请过假。克里斯蒂娜强调的口气中带着些许骄傲。AERI是一个省级工会，跟国家公民联合会和国家工人联合会的关系都不好。母亲曾说，请假的人会跟劳动人民拉开距离。

“但是在领导班子里，几乎所有人都请假，唯独她没有，而她是秘书长。很奇怪是不是？”讲到这里，克里斯蒂娜笑了，“正因为如此，妈妈才很少在家里。就因为这个决定，她才牺牲了业余时间和许多原本属于自己的家庭时间。那是因为除了本职工作，工作日程中还加入了繁重的工会工作。”

当讲到自己的童年时，鉴于克里斯蒂娜的描述，她童年的家庭构成跟她与内斯托尔·基什内尔组成的家庭十分相似。至少在这一点上相似：家庭成员庞大，使得女性有条件外出工作并将精力倾注在政治生活上，孩子在这样的家庭庇护下成长。

当我们在她位于埃尔卡拉法特家中的起居室谈话时，手机铃声响了起来，她直接接通了电话。是一个她在意的人打来的电话。此时我们单独待在一起，没有秘书为她转接电话。接电话时她大声地笑，素颜也神采飞扬，想必电话另一端有人让她兴奋不已。

“没有，没有，我没有欺骗桑德拉·卢索。啊，你原来不肯出现，现在却要过来，为了不让她只听一面之词？好，我觉得很好。对了，你得在球赛以前赶过来。”

挂上电话的时候，她又笑了。

“马克西莫说，让我不要骗你，还说他现在就要过来，为的是让你不要只听我的一面之词。你注意到他是谁的儿子吗？完美的基因啊！让我不要骗你，他说的，脸皮真厚啊。”

这个电话让她快乐，面容也为之改变。马克西莫在她生活中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不是因为他是克里斯蒂娜的儿子，而是因为他这个人能让她愉快。他很少对克里斯蒂娜让步。他也不是依偎着妈妈的乖宝宝。马克西莫跟她开玩笑，逗她，让她欢笑。他始终生动活泼，流露出一种幽默感，既像他父亲内斯托尔，又和他父亲一样有自己的特点。他讲话辛辣、略带嘲弄，而且机警聪慧。我已经见识过了，克里斯蒂娜是如何回应的，这些情感的刺激让她从内心缓和情绪，回归成一名普通人。后来，她告诉我：

“我不知道内斯托尔是不是曾经骗过我，就算他骗过我，也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我能确定，那就是他从没让我觉得无聊。他自己也曾经这样对我说过，在这个世界上，绝不会让他感到厌倦的人就是我。自从认识他，直到他离世，内斯托尔都能让我笑起来。”

父 亲

或许讲述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正如此刻所见，我们要去接近克里斯蒂娜童年世界里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她的父亲。克里斯蒂娜说过，她父亲是“反庇隆主义者”，还说，要想了解他的反庇隆主义性，就必须理解她父亲所认为的一个极端分子和塔利班分子，两者没有差别。这样辛辣的评语，她父亲爱德华多·费尔南德斯定能心领神会并付诸一笑。无论如何，克里斯蒂娜与他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

“这是一段艰难的关系，因为我出生之后，我父母才结婚。也就是说，我是单身妈妈生下的女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后来才知道的，因为我看了我的出生记录还比较了日期。他们的结婚日期在我出生之后，但在我妹妹降生之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姨妈和外公跟他一直关系不佳。因为这件事，还因为他在政治上反对庇隆主义。他不喜欢黑人。”克里斯蒂娜说道，尽管说话的语调显示出她并不愿意这样生硬地说自己的父亲。“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算是移民后代的一种文化。我的祖父母是西班牙人。他们两手空空来到阿根廷，但勤劳能干，有胆识，并最终拥有了一家奶牛场，获得了较好的经济地位。那时候我爸爸清晨就起床给奶牛挤奶，是他告诉我的。但他不喜欢在农村干活，因为他说农村人烟稀少，而且总得弯下腰干活。总之，他就是这样的人。我祖父母也卖田产，后来又经营花房。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去贝尔城，那时候这一带还是农村，能看见‘玻璃房’，他们就是这样叫那些花房温室的。我是喂牛奶养大的，我妹妹也一样。妈妈不能给我提供充足的奶水，所以每天爷爷奶奶都送来奶牛场的新鲜牛奶，然后在家里加热、稀释。爷爷奶奶生活得很好。后来，他们开始购置土地，买了很多土地。移民都有这种对土地砖石的疯狂热情。他们一共是兄弟五个，都获得了不错的经济地位。因为我爸爸不喜欢在农村劳动，祖父母就给他在三号线上买了一辆小型公交车。他曾经当过公共汽车司机，而后又买了两辆车，最后成

了公司的合伙人。”

这位父亲跟她是有距离的。当克里斯蒂娜说起他的时候，这种距离感就显现了。她脸上不再有光彩，那种马克西莫打电话过来时，或者像追忆母亲为她缝制衣裙的可爱细节时出现的那种神采。她与父亲在身体上不够亲近。这个男人在克里斯蒂娜出生时还没有跟她母亲结婚，即使在婚后，他搬过来跟妻子全家人一起生活，也还始终保持着距离。然而，他仍旧将自己的一些特征传给了克里斯蒂娜。多年之后，克里斯蒂娜也仍旧被另一个男人身上的同样特征所吸引，那就是幽默感。

“我身上有不少父亲带给我的东西，”克里斯蒂娜说，“我有父亲的那种辛辣尖刻。我妈妈是个没有幽默感的人，不仅如此，她根本不懂得那些笑话，甚至让她觉得很麻烦。爸爸很辛辣尖刻、洞察力强、极为聪明。我永远忘不了当我告诉他，我要嫁给内斯托尔时他的反应。我们坐在他的轿车上，因为他总是载我到中学，后来也载我到我就读的各个地方。那一天，我告诉他：‘我要结婚了。’他当时几乎不认识内斯托尔。他对我说：‘要结婚了？但你知道吗，婚姻可不像你挂在壁橱里的衣服，可以穿在身上试一试，不合适就换另一件。你要做什么，自己确定吗？’我回答说：‘确定！’我们俩之间的对话就是这样。他就没有多说什么。内斯托尔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戴着方框眼镜，穿着绿外套。我爸爸就对我说：‘这个人好像刚从山上下来啊。’非常轻蔑。我觉得他可能是觉得内斯托尔看起来像是那时候庇隆主义劳动青年联盟（JTP）的人，那些人操纵着阿根廷电车工人联合会（UTA）。因为我爸爸是公司合伙人，他那时候正跟那些人做斗争，因而特别厌恶他们。”

如此一来，克里斯蒂娜少女时代的家庭结构就慢慢浮现出来。妈妈是一位一直没有请过假的工会成员，她还积极地加入了党派组织。而父亲是一位雇主，不能忍受不得和工会的人谈劳动条件的状况。家里还有一位外祖父和一位姨妈，他们虽然能接受和她父亲居住在一起，但不

会忘记他给克里斯蒂娜母亲的女性尊严造成的伤害，因为她生下第一个女儿时还是单身。人际关系当中的这道伤痕，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可修复的，虽然小妹妹席塞乐的降生，使得家庭关系得以缓和。

“爸爸很宠爱她，她也很爱爸爸。他对席塞乐和对我非常不一样。当爸爸最终还是跟妈妈分开、离开家的时候，席塞乐特别气愤。不得不说：爸爸容易移情别恋。”

克里斯蒂娜的父母相处得一直不好。他们是那类不能互相理解的众多夫妻当中的一对。两人之间毫无相似之处。“对于他们的关系，我从来不去过多分析。”克里斯蒂娜说。后来当她对我说起她在心理学学习上遇到困难时，我就再次想起了上面这句话。

说到妹妹的时候，她截然表示，妹妹是家里最受宠爱的人。“我总是指责妈妈，比起对我，妈妈爱她更多，这一点妈妈也不能否认。而且也是千真万确。”她随口说出了这几句话。大家都很爱席塞乐，克里斯蒂娜和内斯托尔也是一样。席塞乐是位女医生。她的职业生涯一直是在公立医院，从没有在私人诊所从业过。她由于罹患肿瘤而退休，几年前曾经遭受精神分裂的困扰，现在已经痊愈了。

“有人说，我才是得精神分裂的那个人。对他们来说都一样，反正他们也分不清。他们总是把一个人当做另一个人，忽视了在一个家庭当中，看到一个人如此年轻，却又遭受这么多痛苦，这意味着什么。当她发病时真是太糟糕了。席塞乐很聪明，人也很敏感。极度敏感，我可以这样跟你说。得这样病的人对事物敏感度非常高，以至于你会觉得他们几乎是在给你占卜未来或者觉得他们可以读出你的心思。当患者接受治疗的时候，疗效很好。只有他们接受治疗，麻烦才能结束，因为一开始席塞乐不肯用药。对我来说，我觉得她的病很厉害，也很令人痛苦。我俩的关系一直很密切，超过普通的姐妹关系。她依赖我，胜过我依赖她，因为我妈妈总是把她托付给我。‘跟你妹妹一起出门。’‘不要，妈妈，我不想跟妹妹一起出门。’但她还是把任务放在我肩上。这件事曾让我很